

和谐与发展研究文库

和

谐

与

发

展

敕正合口与构建

——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

周志山 著

本书对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做了初步的系统研究，指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层底蕴，并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以及和谐社会的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等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以期全面地解读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复调式意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和谐与发展研究文库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

整合与构建

——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

周志山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追求和最高境界,也是马克思哲学社会理论中的深层底蕴,更是当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将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该著以马克思“和谐社会”为主题,全面阐述了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和谐社会”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与价值观,以及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本书反映了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供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党政干部参考借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合与构建: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周志山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和谐与发展研究文库)

ISBN978-7-313-05103-5

I. 整... II. 周...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6080 号

整合与构建

——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

周志山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 字数:242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

ISBN978-7-313-05103-5/D·165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头一回为文库写序言,有点为难。这五种书打包出版,各有主题话语,各有内容专攻,各有逻辑套路,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学问显然不济,很难就每本著作絮言一一。我之所以“硬写”,往雅了说,支持年轻学者出书这是文化功德;往俗了说,策划者与本人是老朋友盛情难却。

从和谐社会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上看,这套书值得关注。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历史性飞跃,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理性反思的宝贵成果。尔今,四十五岁往上年纪者都耳熟能详一段最高指示:斗则进,不斗则修。其后果呢,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几近民族自毁之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中国人告别了短缺经济之苦,喜气洋洋地步入了小康社会。可是,历史的进程从来是圆与缺相伴而行的,与此相形而出的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冲突……概而言之是公共产品的短缺。诸如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之类,有人把它们喻之为新“三座大山”。面对如此的负面社会现实,近两年来,关于改革开放进程得失的评估、下一步发展路径的讨论、争鸣,从理论精英到平头百姓,都不同程度地“热”入其中。若从开放言论的社会现象而言,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精神表征了,可是从底里说,它也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在所难免的不和谐病灶和问题。假如一任这类问题漫漫,势必减弱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员力,动摇百姓对社会转型的信心和参与热情,异化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正是出于对如此重大国事的反思与总结,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方略,为坚定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就着如此宏大的背景来考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用一句理论评价的套话讲:这套书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从和谐社会所包容的理论空间上看,这套书值得关注。在我看来,和谐社会理念与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是同一质级的治国理念,区别在于重点指向而已。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一经提出,释者蜂起,成果汗牛。这一方面表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理念激发了各学科理论职业者的创作灵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法学……纷纷觉得“有话要说”。更有学者在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上动脑筋,在可操作性上进行着探索。究其所以然,是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长远复杂系统的社会大工程,所涉及的理论层面和操作对策范围的包容量太大了。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视角都可以介入其中。(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费孝通前辈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即社会学前

瞻的方向应该“从共存的生态秩序研究进入共荣的心态研究”。这一思想启发人们,和谐社会的研究不必局限于外在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关系层面,要深入到人的主体自身。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和谐也在于心性。如果认可我这样的说法,人们就有理由呼唤社会心理学的声音。)这正如文库策划者所言:“和谐社会的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绝非个别人或某一学科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才可能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这番话作为策划者是逻辑自洽的。这套文库的作者们在大量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哲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社会学视角切入,讲了作者要说的话。在研究方法上也各有不同,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这一切全凭读者去选择了。

作为序言者,我要为这套文库美言上几句话,即它是一面聚焦于和谐社会的学术广角镜。换个说法,如果人们不囿于陈规的学科界限,它们统统可以归结为“社会理论”的大范畴,大理论。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一文,引起学界纷争。他在批评经典社会理论沉湎于基础性概念之争的同时,提出了区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认为后者采用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意图。假如读者认可这个见解,也许会更加关注这套文库。

谷迎春

2006年4月于杭州

前 言

“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追求和最高境界，也是马克思哲学社会理论中的深层底蕴，更是当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将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理应重视和加强对这一论题的深入探讨。本书以马克思“和谐社会”为主题，全面阐述了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和谐社会”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与价值观，以及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

一、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揭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历史地把握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与此前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谐社会”观的理论渊承及批判性扬弃之关系，同时还能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超验维度和崇高命意。“和谐社会”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价值追求，它所包含的“两大理论贡献”（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和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作了大量前瞻性的论述，做出了充满理想的描述和构想），“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二是对未来社会若干基本原则的前瞻性论述；三是描述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方法论特征），成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最富价值的启示。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英雄主义历史观和人性论，基于“理性”观的考察方法，并未赋予和谐社会以真正科学的内涵，相反，由于它游离于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之外而仅仅是道德理想和价值原则的构造物，因此，它被以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超越是必然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和弘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人文关怀，并将这种价值理想的主体承担者确定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扬弃和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人性史观和理性史观的根本缺陷，将社会主义社会奠基在社会矛盾运动由以展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认为价值原则蕴含在社会规律和经济必然性的展开之中；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们观念形态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平、公正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二、马克思“和谐社会”本体论

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本体论,强调以社会为本,以生活为本,以人为本。从社会本体到生活本体再到以人为本,并不是说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中包含着三种并列的多元本体,它们只是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和谐社会当然要以“社会”为本位。它不仅反对把社会整体的发展归约为单一的经济增长并将其置于绝对优先和无限扩张的地位和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马克思社会研究的主导范式,必须实现由“冲突论”到“和谐论”的历史转换。这种转换,既是从以往所谓“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向当代“和谐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域的转变,也是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上的重新定位。“和谐论”的社会研究范式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思维。

生活本体是对社会本体的具体化,它追问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和生活意义。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也可以看作生活世界观的理论表达。马克思生活世界观告诉我们,以生活为本源,正确认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协调性,以及生活与生产、生活世界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立足点和意义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活方式。

和谐社会本体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本论”是马克思“和谐社会”本体论预设。尊重人、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原则,马克思终生追求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一命题和原则的充分实现。马克思“人本论”体现为实践性、科学性、价值性、制度性、人民性等基本特征;社会发展必须是“通过人”、“依靠人”和“为了人”的发展。

三、马克思“和谐社会”方法论

在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方法论意蕴。第一,以和谐为主导的辩证思维方法。其中矛盾思维方法是马克思辩证思维方法的实质与核心。如果说,侧重于从否定性、革命性、批判性的倾向来理解辩证思维方法的实质与核心,是传统意义上矛盾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话,那么,确立以和谐为主导的辩证思维方法,则体现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实践要求。确立以和谐为主导的辩证思维方法,要求我们侧重于对矛盾同一性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研究。第二,以协调为特征的总体性方法。总体性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演变的一种基本方法,它包含着社会诸要素整体发展和总体协调这一“和谐社会”的深层意蕴。强调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强调社会历史总体只有通过人的活动和为了人的发展才能获得人学目的论上的意义,是马克思总体性方法带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第三,以社会建设为特征的社会有机体方法。“把社会看作活动着的和发展着

的活的有机体”是马克思最具本质的辩证方法。其中社会生物学、精神学和实践论是阐释社会有机体的三种不同的路向,马克思坚持社会有机体的实践论路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方法应该特别重视对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入研究,避免将社会有机体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其中如何使社会有机体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状态,坚持国内和谐与世界和谐的统一,使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保持“同构性”,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方法给予我们的若干启示。

四、马克思“和谐社会”实践论与价值观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辩证的批判视野和崇高的价值诉求。首先,全面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实践论基础。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人的多样化需要引起人的多种生产,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是社会文明。诸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程度以及各种生产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协调程度,表征着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在这里,我们把“需要——生产——文明——社会和谐”等环节在生产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关联度和均衡度,看作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实践论基础。其次,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存在、基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超验”设定,也不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是针对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对抗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高度紧张关系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症状所作的否定性批判的产物。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源泉和构建力量植根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展开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当中。再次,追求社会公平是马克思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阐发的公平观,具有现实实践性、社会历史性、人民主体性等特点,它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其中人与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谐是实现公平的根本标志,而这种公平又是在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客观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以及人民利益的最终归宿中找到存在论依据。

五、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

马克思实践观的双重向度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实践的双重向度现实地展开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人一自然—社会”的复合图景之中。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的活力取决于人的活力,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状况,而这种发展状况体现在“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人与人矛盾的和解以及人与社会矛盾的和解”当中。从对抗、冲突走向共生、和谐不仅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两大关系的理论诉求,也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现实课题。

马克思社会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发展观,以形而上境界的目标追求、现实运动的实践特性、制度建构的社会建制为三重意蕴,以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双重尺度,以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发展的总体图景。

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和谐观。马克思的城乡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为基本图式,以城乡无差别的同一到城乡之间的利益对抗再到城乡利益的融合统一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为方法论视域,以消灭城乡差别和对立、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全面揭示和阐述了城乡关系的历史嬗变、基本矛盾和发展前景。马克思的城乡观为我们今天统筹城乡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示。

周志山

2008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1
一、和谐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追求	2
二、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原则与方法	12
三、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超越	23
第二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本体论	36
一、从“冲突论”到“和谐论”: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转换	36
二、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立足点	51
三、人本论:马克思“和谐社会”本体论预设	62
第三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方法论	75
一、以和谐为主导的辩证思维方法	75
二、以协调为特征的总体性方法	88
三、以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社会有机体方法	100
第四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实践论与价值观	113
一、全面生产理论: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	113
二、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	122
三、公平观:马克思“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	136
第五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总体图景	146
一、马克思实践观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	146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总体图景	164
三、马克思的城乡融合观与统筹我国城乡发展	180
后记	196

第一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揭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历史地把握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与此前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谐社会”观的理论渊承及批判性扬弃之关系,同时还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超验维度和崇高命意。如果我们舍弃主观贬义的“前理解”意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的话,那么,这种“乌托邦精神”正是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之构成推动历史演进的精神内驱力^①。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谐社会”观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对乌托邦精神的简单保存或否弃上,相反,基于人的本性的超越性维度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批判性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设计,恰恰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最富价值的启示,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吸纳和融通。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被普遍物化的倾向,使得人们更多地热衷于对现实社会作经验实证化的研究。而正是在在这种经验化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理解倾向中,马克思社会思想中的超验性维度存在着被消解的危险,并使人类社会的形上基础和意义支撑呈缺失状态,这种缺失已经给世纪之初人类的精神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事实上,建立在现实历史原则基础上的超验性维度在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精神”也成为具有现实迫切性的思想课题。当然,应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① 所谓“乌托邦精神”,贺来在其博士论文《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中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因而是人的根本精神”,他把“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实存在状态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称为‘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也就是哲学的根本精神。”乌托邦精神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绝对意识”为价值内核的传统乌托邦精神;一种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乌托邦精神”。贺来博士认为:“否定传统哲学乌托邦精神的绝对性和虚幻性,绝不必然抛弃乌托邦精神本身。”由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所开启的、以“现实生活世界”为根基的乌托邦精神,既能克服传统乌托邦精神的“绝对意识”,又能避免反乌托邦精神的虚无主义,从而有望使人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马克思倡导的“人性整全的价值理想”。(参见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39、84、71、147页。)

笔者认同贺来博士的观点,只是想进一步提出,乌托邦精神是一个十分复杂、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不断被充实进现实内涵的范畴,它并不等同于空想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通常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所使用的含义。这里主要是在人的精神气质、人格修养、理想追求、超越有限的意义上谈论乌托邦精神,可谓是广义上的运用。这种运用与当代西方重新响起的复归乌托邦的呼声,以及在当代社会警示人们有效地抑制工具理性、实用主义,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意义支撑,明显具有理念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对乌托邦精神的理解上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历史投入和历史产出的反差，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和创造，从而将现实社会的困境和未来社会的理想抽象地割裂开来、人为地对立起来，他们始终无法找到从资本主义“病态社会”到未来“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陷入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的泥潭。这是他们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则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论为哲学基础，坚持现实历史的原则和历史实践的致思取向，把人的现实性的存在境遇和对人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之价值诉求，置于人的实际生活世界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并经由人的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内在地关联起来。这既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运动过程，也是一个批判和改造现存世界的否定性过程。因此，马克思社会理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观的超越是必然的。在本章中，我们在概述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基础上，力求辨析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和谐社会”观上的内在关联和本质区别，以期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一、和谐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追求

在西方，“和谐”概念源于哲学。可以说，注重社会和谐在西方社会哲学中有着久远的研究历史和丰富的思想资源，重视社会和谐也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一条重要学术理路。

在古希腊语中，和谐(harmony)的原意是将不同的事物联结或调和在一起，认为“和谐”是事物之间精致的结合，是无与伦比的均衡和协调。最早提出并论述和谐思想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明确把“和谐”作为哲学核心范畴并首先从审美的角度提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两句哲学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美的——和谐”。他们将数学、音乐和天文学结合起来，用数的和谐来解释宇宙的构成和宇宙的美，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和谐是一种极致的美。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则主张“对立和谐观”，认为“和而不同”，指出和谐产生的原因在于对立面的差异和斗争，“从对立的東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東西中产生和谐。”^①在古希腊，柏拉图将哲学中的“和谐”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理想国”的构想，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才能很好地协商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

^① 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页。

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其“单子论”哲学中,提出了由上帝确定的“预定和谐”的命题,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和谐的整体”^①。黑格尔批判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观”是一种徒托空言的“抽象的统一”。认为和谐的本质在于包含着差异与对立于自身之内的统一,和谐产生于“本质的统一”、“具体的统一”。“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而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②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其理论直接渊承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观。其中作为欧洲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顶峰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和谐社会观,即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等,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直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灵感泉源。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起源于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它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6世纪和17世纪,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时期,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有:莫尔和他的《乌托邦》(1516),安德里亚和他的《基督城》(1619),康帕内拉和他的《太阳城》(1623)。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最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充满了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理论上进行论证,而只能以文学的形式幻想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与之相对立。

到了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手工工场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把社会主义思潮推进到了中级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摩莱里与他的《自然法典》(1755),马布利与他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巴贝夫与他的《永久地籍册》,梅叶和他的《遗书》(1729),温斯坦莱与他的《自由法》等。与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满足于纯粹文学的描绘,而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把理想社会法律化、制度化。他们对于“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

①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03页。

② 《黑格尔论矛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1页。

身。禁欲主义的、禁止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①”。显然,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圣西门与他的《论实业体系》(1821)、《新基督教》(1825),傅立叶与他的《全世界和谐》(1803)、《四种运动论》(1808),欧文与他的《致拉纳克郡的报告》,魏特林与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前人不同,他们采用详尽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论证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构想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他们尖锐地斥责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是黑白颠倒的世界”,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欺诈,抨击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和宗教的欺骗。他们指出,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私有制是贫困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数罪恶和灾难的唯一原因。他们因此还得出必须否定私有制的结论。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但有一个明显共同的本质特点,那就是把建立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特别是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构建模式中,和谐社会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在自己的学说中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描述了一个和谐完美、自由民主、平等富足、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为了进一步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承,笔者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和谐社会”观作一些简要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展现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人本意蕴和价值理念。

1.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他在生命的辉煌时期正赶上法国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把圣西门从一个出身显赫的年轻贵族造就成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工人阶级的代言人”^②。少年时期的他就受到法国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立志“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③并实现了从封建贵族思想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转变。法国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4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矛盾重新唤起他“为改造人类的文明而努力”的热忱，决心“为人类的理智开辟新的里程”^①。圣西门由于科学研究而耗尽了全部资产，一贫如洗的他深切地体验到了从前不予重视的阶级矛盾和法国大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的现实，并促使他把“改进人类文明”的抽象愿望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陷入的社会危机联系起来，决心为改进最贫苦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而工作，从而实现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的第二次思想转变。1821年，他出版了《论实业体系》，系统地阐发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和理想社会代替现存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825年，圣西门出版了他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代表作《新基督教》，这标志着他创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厦的完成。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较为深厚的哲学基础，他接受了18世纪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其历史观继承了18世纪唯物主义的理性论。

圣西门的“和谐社会”观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②。为了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和谐社会”理想——实业制度，他对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包括：①在政治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新的压迫制度。与资产阶级理论家极力宣扬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相反，圣西门认为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秩序是极不完善和极不合理的。他列举了“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武断、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③。他讽刺道，法国如果突然失去3000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这些“法国社会之花”，国家就会遭到极大的不幸，整个民族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相反，法国如果死去3万名王公、贵族、主教、元帅等这些游手好闲者，不会对社会带来任何损害。法国的现状到处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有才能的人，是道德败坏的人支配善良的公民，大罪犯惩罚犯了小过错的人。这表明“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列宁在1916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称赞圣西门的这个分析为“圣西门名言”；②在经济上，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圣西门十分关注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特别是“人数最多的最穷苦阶级”的生活状况，对他们的悲惨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圣西门指出，造成工人贫困的原因是一小撮统治者为了豢养行政机构和暴力机关的大批官员，采取税收和公债的形式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致使国民缴纳的税收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造成法国社会危机和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是引起其他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9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7页。

灾难的根源。在他看来,组织经济生活和实行计划经济是摆脱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本途径,而这只有在他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实业制度”下才有可能;③在道德和整个意识形态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残酷的利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圣西门指出:“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①“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也应当归因于这种利己主义。”②利己主义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恢复和获得特权和财富,驱使他们贪得无厌地吞噬别人的劳动果实,驱使统治者发动掠夺他国的侵略战争。利己主义是社会分裂和瓦解的祸根,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④在社会发展形态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存在于“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社会制度。针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资本主义制度绝对化、神圣化,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永恒性观点。在圣西门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存在于封建旧制度和他设计的“科学和实业制度”之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制度”。同旧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一种新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只有在其创设的“科学和实业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和谐。

显然,“实业制度”是圣西门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的黄金时代,是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人类最美好的“和谐社会”制度。关于实业制度构建的目的,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最大程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人们生活得到最大福利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他说:“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③实业制度的目的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福利,“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最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④这是实业制度之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表现。圣西门认为,生产是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只有充分发展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才能满足人们需要。因此,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的秩序,是圣西门建立实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

根据圣西门的设想,实业制度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统治和压迫。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成了社会组织的主要职能。而管理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6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1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3页。

④ 《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3页。

权力的人都应当由选举产生,这些人除了得到公众的尊重以外不应得到其他报酬。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应当是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造福,特别是为人类最多数的、最贫穷的阶级谋利益的社会管理人员。为了实现满足人们需要和造福社会这一目的,圣西门认为,必须建立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财产所有制。在他看来,社会的存在决定于所有权的保存,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这是与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总问题”。“人人都要劳动”,是圣西门提出的一项重要社会主义原则。他认为,未来社会有最大限度的平等,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实行普遍劳动的原则。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应当是从事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劳动,人人都应在对社会有益的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天赋和才能。他指出了劳动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培养高尚情操的意义,“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①。

圣西门还提出,在实业制度中应建立新的道德风尚。“道德实际上是随着实业的完善而发展的”,^②新基督教应该成为实业制度的道德支柱。这是圣西门的一个唯物主义观点。他提出新社会的道德目的,是“使每个人有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最有益的贡献于社会和大多数同胞”,^③伟大的道德原则就是以改善人类大多数、最穷苦阶级为目的。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努力提倡集体主义思想。他提醒人们,旧制度下养成的习惯,是建立真正新制度的巨大障碍,凡是想危害社会以寻找幸福的人必将受到社会规律的惩罚;真正的幸福就是抛弃满足私人欲望的动机,抛弃功名心,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为了建立新的道德风尚,圣西门认为还必须重视教育工作,不仅要重视完善的知识教育,同时必须十分重视道德品质和各种能力的培养;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要使学生广泛了解和接触社会,以适应将来社会工作的需要;还应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每个人的收入应当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等等,这是圣西门实业制度的重要特征。圣西门坚信,未来社会这一“文明的王国即将出现”。

2. 傅立叶的“和谐社会”

西方近代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他认为,既然在自然体系内存在着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存在着和谐的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和农业、家务和教育、生产和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在19世纪初,他先后发表了《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论》、

① 《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8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